

“革命”与“反革命”： 1920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王奇生

近代中国以“革命”频发而著称。美国研究革命现象的著名学者詹隼(Chalmers Johnson)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所有历史个案中最大且最复杂的革命样本。”^① 邹说也认为，中国革命是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发展最复杂，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最丰富，时间也极长的集体政治行动^②。

在中国革命史上，192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长期以来，中共以五四运动为界标，将之前的革命称作“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革命称作“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划分革命“新”、“旧”的标准，主要是以革命的领导者、革命的参与群体以及革命的对象和目标之不同而设定。若超越这种一党立场的革命史观，1920年代在革命史上的转折意义还可以放在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下加以观察。

清末以来持续十余年之久的“革命”与“改良”之争因辛亥革命而告终。然而经过民初短暂的民主宪政之不成功尝试后，革命的呼声再度在中国掀起。与晚清由单一党派主导革命不同的是，1920年代的革命激变为多个党派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同时并起。虽然三党在革命目标和革命对象的设定上不尽相同，但都竞相揭橥“革命”大旗，且均以“革命党”自居。革命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的局面。

在三大党派的大力宣导下，不仅“革命”一词成为1920年代中国使

① 詹隼：《革命：理论与实践》，郭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中文版序言。

② 邹说：《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新路向》，《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

用频率极高的政论词汇之一，而且迅速汇聚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逐渐凝固的普遍观念，即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实现国家统一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手段，改良及其他救国途径（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学术救国等）被视为缓不济急和舍本逐末。革命高于一切，甚至以革命为社会行为的惟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革命”话语及其意识形态开始渗入到社会大众层面并影响社会大众的观念和心态。

长期以来，学术界考察 1920 年代的中国革命，目光仅投向国共两党，而轻忽和漠视中国青年党及其国家主义思潮的存在和影响。这种长期习焉不察的轻忽和漠视，其实仍是当年国共两党“革命”意识形态之余绪，亦即将青年党定性为“反革命”党派。历史研究者有意或无意间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历史进程中取得胜利的一方和比较“进步”的一方，潜意识层面实际仍未脱“优胜劣败”和“成王败寇”观念的束缚。事实上，历史进程全貌的“复原”和解析，必须兼顾当时参与历史的各方，无论其胜败，亦不论其“进步”或“反动”，均应是史学研究关注的对象。

1920 年代的中国革命，本是一场由不同党派、群体以及精英与大众所共同发声（赞成或反对）、组合（推动或抗阻）而成的运动。有关这一段革命历史的书写，不能只让一个党派发声，而遮蔽其他党派的声音。我们有必要尽力“复原”和“再现”那个年代里不同党派“众声喧哗”的状态。本文试图脱逸“国共合作”的传统框架，将 1920 年代的中国革命放回到国、共、青三大政党党际互动的历史场域中去观察和思考，侧重对三党各自所表述的“革命”话语予以比较分析，尝试从观念史的层面来重行检讨这场革命的开展，冀能对以往史学界有关此段历史的书写因党派立场所导致的偏执和专断有所修补。因本题所涉面过广，本文的讨论仅是举证式的粗疏描述和分析。至于各党内部之细密爬梳，尚待另作专文探讨。

一 从一党独“革”到三党竞“革”

据金观涛对“革命”一词在晚清言论界所出现的次数及其所指涉的含义进行量化统计的结果显示，1894~1898 年间，“革命”一词只是零星出现，且主要指涉法国革命；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一词开始出现新的含义，如代表彻底变革的“宗教革命”、“诗界革命”和用暴力推翻旧王朝的“排满革命”等。1901 年以后，“革命”一词开始在中国士大夫

著述及报刊言论中较为频繁地出现。^① 1902年，梁启超就晚清知识界对“西学”→“变法”→“民权”→“革命”的认知变化情形作过一精彩的描述：

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王安石变法，为世诟病，数百年来，变法二字，为一极不美之名词。若于十年前在京师尤习闻此言，今则消灭久矣），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②

梁氏之言，极生动地说明了“西学”、“变法”、“民权”、“革命”等话语在晚清中国交相递嬗的情形：学界由最初的“骇西学”、“骇变法”，进而“骇民权”、“骇革命”。而且“骇革命”也很快转化为“不骇”。两年之后，梁启超即观察到这一变化：“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③ 梁启超不知是否预料到，“骇革命”之后再无可“骇”。当“革命”一旦代替“民权”，“革命”却找不到别的替代，从此历久而不衰^④。晚清知识界对革命由“骇”转为“不骇”，从恐惧革命到竞言革命，使革命成为一种强势言论，似乎仅是数载之间的事，不能不慨叹晚清言论界嬗变之速。不过，此时革命尚未成为政治正确的评判标准。桑兵即注意到，在庚子勤王前后，革命与不革命，还处于革新进步的同一阵营之内，可以平等地进行对话。就当时多数趋新士绅而言，“革政”比“革命”更容易接受，其原因并不一定是前者的方

① 金观涛：《观念起源的猜想与证明——兼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

②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东京，《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

③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丛报》第46~48合号，1904年2月。

④ 吕芳上在《从改革与革命到告别革命：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省思》一文中提出：从今天来看当时戏剧性的历史转变，我们不禁要追问：接受“革命”这一口号的心理障碍是什么？为什么一旦“革命”代替了“民权”，“革命”却找不到别的替代？收录于孙康宜、吕芳上编《变：新局面的创革》，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丛刊第10号，2001年。

式较为温和，反倒是所带来的变化更具实质意义，而且不必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当时革命党人也并不以“革命”自囿，而排斥其他方式和派系。^①

1910年，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对华侨演讲《中国革命之难易》时，声称“‘革命’二字，近日已成为普通名词”。“革命”既成“普通名词”，至少表明此时知识界“言革命”之普遍。不过，孙中山也注意到：“在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动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口不敢道之，耳不敢闻之。”^②在美华侨参与孙中山革命最早，未料直至辛亥革命前夕他们之中尚“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以此推测国内普通大众，其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亦当属情理之中事。

与清末革命与改良互争雄长不同的是，到1920年代初，革命为中国多数党派所认同。除国民党外，新起的共产党和青年党亦以革命为诉求。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演变为“多党竞革”。这一局面的形成，意味着北洋军阀之失道，已经超过了晚清朝廷。康、梁等人当年尚寄希望于清政府推行渐进性改革。而袁世凯死后，北洋体系内再也未能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统一全国的强势人物，中国出现了一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格局，即中央政府失去对全国局势的驾驭力，形成大小军阀分裂割据、频繁混战的局面。这一局面的持续使中国人几乎整体性地陷入绝望。

另一方面，民国肇建十余年间，因民主宪政的不成功试验，特别是1923年曹锟贿选，使约法、国会声名狼藉，助长了知识界对共和民主宪政的失望和再起革命的信念。《东方杂志》在当时中国言论界大体属于比较稳健和偏于保守的刊物。即使是这样的刊物，是时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肯定革命与暴力的正面作用^③。

中国共产党（1921）、中国青年党（1923）和中国国民党（1924）的成立和改组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三党之间的分歧不在“要不要革命”，

①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绪论，第14~15页。

② 孙中山：《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说》，1910年2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441页。

③ 如有一位名为“化鲁”的作者即在《东方杂志》接连发表文章呼吁革命：“政治建设也唯有经过大革命与破坏后才能成功。再说得彻底些，平和是不能无代价得来的，平和的代价就只是鲜红的血”；“现在该不是爱平和的时候了，政局已弄得走投无路，便要忍耐也无可忍耐了。暴力虽不能驱除暴力，但正规的力是可以驱除暴力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国民的正规的力。”“现在的中国非经过武力的革命，不能收拾。武力革命的结果，必不免趋入极端。”见化鲁：《“爱平和”的中国人》、《棒喝主义与中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2、19号，1923年6、10月。

而在“如何革命”以及革命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国、共两党将他们合作进行的革命称做“国民革命”，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青年党自称其革命为“全民革命”，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表面观之，相互之间并无显著区别，实则三党各自的诠释大有不同。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自称其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任务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①。中共“二大”对此作了修改，分别提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最低纲领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进行的方法是援助国民党继续“民主革命”。不久，中共将“民主革命”改称“国民革命”。据陈独秀解释，之所以改名，乃鉴于“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而“国民革命”这个口号，更适合于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②

共产党人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认为不同的阶级因其经济地位不同，其对革命的态度亦判然有别。“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越向下层的无产阶级越富于革命性”。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中共坚信自己是全世界最先进阶级的代表，是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宰，因而具有强烈的阶级优越感和历史使命感。中共认为，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过渡，国民革命强调联合，社会革命强调分化。共产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完成国民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在他们看来，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所进行的革命如同俄国的二月革命，而他们的目标则要发动十月革命，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中共话语中的“国民革命”，实质上是“阶级革命”。

“国民革命”口号提出后，很快为孙中山和国民党人所认同^③。但孙和国民党人对“国民革命”的理解和解释与中共并不一致。孙中山的政治理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第5页。

② 陈独秀：《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上海，《向导》第128期，1925年9月。

③ 据考证，“国民革命”一词最早出现于1906年，由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起草的《军政府宣言》中，但此后16年间未见再使用，直到1922年中共重新赋予其新的内涵后，才逐渐风靡。参见金冲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载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第115页。

想和革命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和一个在政治、经济上比西方更平等的改良社会。他不同意在中国实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在孙中山看来，俄国人的共产主义并无优良新奇之处，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具包容性，更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国情是患贫。中国人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还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对立和冲突，所以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和缓进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

但孙中山“联俄”、“容共”以后，其思想仍难免受到苏俄意识形态的影响。国民党“一大”通过两个关键性的文件，一是国民党新党章，一是大会宣言。这两个文件均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参与起草，前者是以1919年12月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颁发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为蓝本，后者是以1923年11月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为蓝本。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最明显之处有二：一是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解释中，引入了阶级的概念和理论；二是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解释中，加入了反帝的内容。

仅从语义上看，国、共两党高呼的“打倒帝国主义”，与中国青年党提出的“外抗强权”口号，似无多大差别，但前者实际上隐含着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观，至少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透着俄式革命的潜在效应：第一，将中国革命与西方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衔接在一起，组成一条世界革命阵线，带给中国的革命分子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他们的奋斗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也为了全世界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第二，革命的任务和范围扩大，不仅要推翻中国的过去（封建主义），也要打倒西方的现状（资本帝国主义），所以革命不再像过去以为的短时间内就能结束。^①

中共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命题也得到了国民党人的认同。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主张，正是针对国共两党的“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而发。中国青年党在其建党宣言中，首先批评了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符合国情，认为工人仅占全国人口的4%强，以如此少数的工人实行专政，万不可能。况且全国农工商学各界，同受军阀压迫，独倡一阶级专政，会失去大多数民众的同情，不

^① 参见吕芳上《从改革与革命到告别革命：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省思》。

能进行大规模的革命。^①其次，青年党认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而不是国内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矛盾，在中国新式产业尚未发展，劳资阶级不甚悬殊的时期，主张阶级争斗会助长混乱，妨碍国家统一^②。

青年党自称其宗旨是：“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③“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本是五四爱国运动中所提出的口号，而青年党进一步将其阐释为“对内为民主革命，对外为民族革命”^④。具体方法为“联合农工商学各界，先求‘全民武装’，进而实行‘全民革命’，以造成‘全民福利’之国家，而不偏于任何阶级”^⑤。

在中国青年党看来，国、共两党的革命是“不彻底的”，甚至称不上是“真革命”，而是“假革命”。其理由有二：一是国共“联此军阀以倒彼军阀”；二是国共“联赤帝国主义以倒白帝国主义”。前者指联冯玉祥、唐生智等人，后者指联苏俄。在中国青年党人眼中，冯、唐固然是旧军阀，苏俄也是变相的“新帝国主义”。青年党人自认其革命主张比国、共两党更激进，更鲜明，更彻底。因为他们反对联络任何军阀，也反对依靠任何欧美国家，主张“内求统一，外求独立”；“内不妥协，外不亲善”。^⑥

“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在列宁的论述中，乃指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垄断性、寄生性和垂死性。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后，几乎成为西方列强侵略的代名词，而且逐渐形成一种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青年党沿用五四时期的“外抗强权”而拒绝采纳“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意在警觉“帝国主义”概念背后的世界革命观。青年党认为，苏俄主张的“世界革命”，其实质是“使全世界各弱小国家归顺苏俄”^⑦。故青年党对国、共所主张的

① 《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95页。

② 《国家主义青年团宣言主张及简约》，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117~118页。

③ 李璜：《谈谈我们》，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第10~11页。

④ 曾琦：《答穆济波书》，北京，《醒狮》第6号，1924年11月15日。

⑤ 《通信（曾琦致郑伯奇）》，《醒狮》第7号，1924年11月22日。

⑥ 《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宣言及简章》、《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122~123、126~136页。

⑦ 李璜：《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不适宜于今日中国》，《醒狮》第95号，1926年8月7日。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观念，颇不以为然。在青年党看来，世界革命的目标，是要把全世界压迫弱小民族侵略弱小国家的各帝国主义者一起打倒，不仅渺不可期，从策略上讲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本不是一个整个的组织，相互之间含有竞争冲突的成分甚多。对于中国的侵略也不是国际的，而是国别的，中国若想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只有利用列强间冲突抵触的形式，从中分化应付，断不能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反促成列强的团结一致。^①除青年党外，当时中国社会及知识界，其实亦有不少人视“打倒帝国主义”为苏俄世界革命的战略口号。如《国闻周报》社评称：“反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非二十世纪之时髦名词耶。然此时髦名词苏俄可用之，中国则不宜。”^②

实际上，无论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都带有浓烈的民族主义意味。至于说某一党派比另一党派更具民族主义，其实很难落到实处。真正对实际政治起作用的，恐怕更多是各政治力量对民族主义加以政治运用的策略。^③

二 “革命”与“反革命”

1920年代，中国三个以“革命”为主旨的党派之间，实际经历了多次分合互动的过程。粗线条的描述大致是：先是中国青年党与中国共产党的部分成员从少年中国学会分化而出，同属“五四”一代的共、青两党十分一致地视辛亥一代的国民党为“落伍”。继而是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形成国共合作共同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局面。在北伐前后，以中国青年党为一方，以国、共两党为另一方，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互为论敌，形成激烈的“主义之争”，导致国、共两党联手打压青年党的局面。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国青年党一面继续反对共产党的“赤化”，一面坚持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中国国民党则在武力“清共”的同时，亦强力钳制青年党；中国共产党也是两手出击，将主要矛头对准国民党的同时，也不忘兼顾青年党。于是形成国、共、青三个党派循环敌对和相互抗衡的局面。

当1923年中共党员开始加入国民党时，国民党号称有20余万党员，

^① 《中国青年党暨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第115页。

^② 天生：《呜呼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天津，《国闻周报》第1卷第6期，1924年。

^③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自序。

而中共党员人数不过400多人。但中共不仅没有顾虑可能被国民党吞并和溶化，相反抱有要充当革命动力去推动国民党革命的意图。孙中山固然轻视中共弱小而不愿与之对等合作，而中共实际上更瞧不起国民党。在中共“新青年”眼中，国民党人已是“老朽不堪”的前时代人物，是落伍者，加入国民党，意味着共产党退化。^①当时共产党潜在的社会信仰群体主要是“五四”知识青年。孙中山容纳共产分子的一个重要考量，即是要将这批“五四”新青年吸纳到他的革命队伍中来。在当时孙中山的认知中，国共两党的分别，一是“老同志”，一是“新青年”。^②“老同志”固然疑虑“本党名义被彼利用”，而“新青年”更担心与“老同志”合流会失去青年社会的信仰。

同样，中国青年党不仅自称“革命党”，而且以“新革命党”自诩。称“新”是为了区别于国民党之“旧”。与中共党人的心态一样，在青年党人眼中，国民党人已是“过去人物”，“早失信用”，“既有二三先觉之士，亦无支配全党之能，若欧美政党之旗帜鲜明，纪律严明者，殆难以望诸彼辈”。亦充分流露出对国民党的藐视之态。他们还批评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是一种依赖行为，“与过去人物同为一丘之貉”，有失革命党的独立精神。^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眼中，国、共、青三党的政治理念并非如它们相互关系那样水火难容或分合诡变。如在当时胡适的印象中，“国民党、共产党及国家主义党，均为中国青年学生所提倡，然打倒军阀与解除外人之压迫，实为以上三党之共同宗旨。”^④事实上，无论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国家主义，也无论是国民革命、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在1920年代各自都获得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响应^⑤。胡适还认为，以1923年为界标，中国现代思想可以划分为前后

① 《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第87~88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21页。

③ 《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96页。

④ 《胡适在英宣言》，天津，1926年11月11日《大公报》。

⑤ 到1927年国民党清党前夕，中共有党员近6万人，团员约3万人；国民党号称有数十万党员，甚至有百万党员之说；青年党到底有多少党员，未见具体统计，但自称直接受其影响的青年至少有10万人。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27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29~30、39~40、85页；陈永发《中国共产党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第59页；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第66页。

两个时期：之前思想倾向于个人主义，之后思想倾向于集团主义。“1923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① 国、共、青三党都强调党和国家利益至上，强调集团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三党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是殊途同归。

然而富有吊诡意味的是，1920年代三个以“革命”为共同诉求的民族主义政党，它们相互之间其实是争多而合少。同清末“革命派”与“改良派”之争相比，这个时期同聚在“革命”大旗下的三大党派，其争斗反显得更为激烈，也更为严酷。一方面，“革命”一词已异化成为至高无上的符咒^②，“人人都认为自己是革命者”^③。“革命！怎样一个好听的名词！怎样使我的热血沸腾着呵！”“革命，是的，我们要革命！”^④ 这种对革命的美好遐想和顶礼膜拜，使革命与自由、翻身、解放等字眼紧密相连。革命被建构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和使命实践的正当性。任何对革命的犹疑、迟疑、质疑和怀疑态度，都有可能被戴上一顶“假革命”、“非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帽子。一般人如果批评、质疑或亵渎革命，可能会同时得罪共产党、国民党和青年党。革命在中国社会已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流话语，以至于无人敢于公开标示、揭举“反对革命”的旗帜。甚至军阀一方亦不以“反革命”为名，而以“反赤化”相号召，至少在当时一般民众心目中，“革命”已深具政治正义性与合道性。当时普通社会对国民党的最大异议是“赤化”而非“革命”^⑤，而国民党方面亦极力辩白自己是“革命”而非“赤化”^⑥。

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政党之间，乃至同一政党的不同派系和人物之间，对“革命”的定义和阐释时有差异，而且变动不居。不同的政党和不

① 胡适日记，1933年12月22日，《胡适日记全编》（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257页。

② 1926年冬，一位英国记者特地来华观察正在北伐进行中的国民革命。当他在汉口与国民政府要人谈话时，惊讶地发现：“不到5分钟就要受他们提醒，这政府是革命的。‘革命’两字在他们口中相同于一种符咒。”见蓝孙姆《国民革命外纪》，石农译，上海，北新书局，1929，第47页。

③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678页。

④ 张闻天：《青春的梦（三幕剧）》，《少年中国》第4卷第12期，1924年5月。

⑤ 北伐初期，《大公报》即明言：“广东国民党招致反对最大之点，为主张俄式之党治主义。”见《时局杂感》（社评），1926年9月13日《大公报》。

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曾多次发表“赤化”辟谣声明，参见广州《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4期，1924年3月20日。

同的派系竞相争夺和垄断对“革命”话语的阐释权，争夺“革命”的正统，并试图建立各自对“革命”话语的霸权地位，惟己独革，惟己最革，惟己真革，而贬斥对手和潜在同盟者为“不革命”、“假革命”乃至“反革命”。国民党一再自称是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孙中山容共的一个重要考量，即担心中共“独树一帜与吾党争衡”。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之后，直接要求中共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挥者”，宣称“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①。但在共产党和青年党看来，国民党已经是“腐化”、“落伍”的“旧革命党”，自己才是“新革命党”。

主张革命和反对革命本是政治态度的不同抉择，最初并无善恶或对错之分，然而当革命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诉求之后，当革命成为各方竞逐的神圣符码之后，当革命成为社会行为的惟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之后，“反革命”被建构为一种最大之“恶”和最恶之“罪”，从此再没有人愿意被污名或被标签为“反革命”。1922年，杨荫杭注意到各派军阀所发电报与文告中，攻击他党之辞，“一则曰卖国，再则曰违背道德、违背法律”；“骂人卖国”尤为各派之通用手段，“凡异己者，即以此头衔加之”^②。说明“卖国”在当时是一种人所共弃的政治污名。而是时“反革命”一词刚刚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尚未成为流行语。“反革命”一词大约在1919年前后才出现于中国人的言说中，开始流行大概是1924年以后的事。

“反革命”一词源自苏俄布尔什维克的谴责性语言。1920年代使用该词最早也最频的是中国共产党。青年党指责中共说：“共产党人动辄自炫新奇而以复古讥人，自诩进步而以反动骂人，自夸革命而以反革命诬人。国人之怯懦者往往为其气焰所慑，屏息而不敢辩。”^③中共话语的这种威慑力和影响力，国民党人更深有体会：“自从共产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动辄拿‘革命’和‘反革命’字样劫持中国国民党员，强使接受共产党所定的一切口号。一般党员为力避‘反革命’嫌疑计，不论何种问题，总要以最革命自居，而以‘反革命’为大戒。”^④

不过，一个口号或一个名词之能否产生威力，亦当视时空语境而定。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第592~593页。

② 杨荫杭：《解决时局谈》，上海，1922年2月24~26日《申报》。

③ 曾琦：《共产党之复古反动与反革命》，《醒狮》第68号，1926年1月23日。

④ 王季文：《中国国民党革命理论之研究》，1927年，出版地不详，第3编第1章。

如“反革命”之名只有赐封给那些认同革命的人，才会有被污或受侮之感，而对那些本来就不认同革命的人来说，“反革命”话语的威慑力可能就会大打折扣。1927年2月7日，国共合作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制订了一个《反革命罪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正式立法将“反革命”定为一种刑事罪名。该条例刚刚制订，尚待审议，2月10日，湖北人民审判委员会即初试牛刀，运用该条例审讯数月前在武昌城顽强抵抗国民革命军的北军将领刘玉春和陈嘉谟，控告他们犯有“残害人民”、“占据城池”及“反革命”等罪状。当审判委员会主席徐谦指责刘玉春为“反革命”时，刘玉春反驳说：“我从未入革命党，何言反革命，中国人民四万万，隶革命军者不过二十余万，其余者皆反革命耶？”^①

刘氏言下之意，只有革命的人才具有反革命的资格，而本来就不革命的人，也无所谓反革命。这是一个颇堪注意的论理，被认为“反革命”的人，并不认为自己“反革命”。而在当时国共两党的言说中，“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如蒋介石训诫黄埔学生说：“古人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余更续数语曰：‘不为信徒，便为叛逆。’更进一言曰：‘不为同志，便为寇仇。’”“不为革命，便为叛逆。”“所以不革命这句话，简直就是说反革命罢了。没有不革命的人，而不做反革命的。”^②

毛泽东与彭述之当时分别担任国、共两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毛为代理），主掌两党的意识形态诠释与宣导。两人的下列表述大体相似。彭氏斩钉截铁地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最坚决的时期了：不革命，便要反革命。”^③毛氏也义正词严地指出：“中国革命派、反革命派已到了短兵相接时候……在中国现在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从前灰色的中立的面具现在是不能再戴着了。”^④

国共两党精英的革命话语内涵虽大有出入，但其内在逻辑理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革命”与“反革命”被构建为非白即黑、非圣即魔、不是即非的二元对立，二者之间不允许存留任何灰色地带和妥协空间。“中立派”、“中间派”、“骑墙派”、“第三种人”或难于自存，或备受谴责和排

① 刘玉春：《百战归田录》卷2，线装本，1930年，第23页。

②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348、549页。

③ 述之：《目前革命中的联合战线问题》，《向导》第185期，1927年1月27日。

④ 子任（毛泽东）：《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广州，《政治周报》第3期，1926年1月。

斥，甚至认为“不革命”比“反革命”更可恶，更危险，因为“不革命则真意未可知，尚有反复余地，至反革命斯无复能反复矣”^①。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或激进与温和之别，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你死我活。而且“反革命”是一个极为灵活的概念，可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囊括许多不同的敌对阶层。如中共对国民党左、右派的划分和定性即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将右派、左派都划在革命阵营之内，后来称左派为革命派，右派为不革命派，再后来则称左派为革命派，右派为反革命派。

1927年1月，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一篇名为《甚么是反革命》的文章，林林总总、虚虚实实罗列了32项反革命罪名，随后不久，作者觉得尚遗落不少，又列举出21项，总计多达53项，不仅涉及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经济等领域，更泛化到伦理道德和个人私生活、性格、品行等层面，如助长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破坏工农运动、反对联俄联共等固属“反革命”之正宗，连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畏难苟安、委曲求全、阳奉阴违、好逸恶劳、行动暧昧、模棱两可、吸食鸦片、赌博嫖娼，甚至骄傲自信、感情冲动、意志不坚、重视个人感情、抱家庭乡土宗族观念、党员不纳党费、不参加会议等等亦被归入到“反革命”行列，普化、激化到几乎令人动辄得咎的地步^②。“革命”与“反革命”被想像成非常宽广层面的各种社会力量交织在一起的对立较量。《大公报》称：“国人喜言革命，而不革命者实居多数……乃今之言曰：‘不革命即是反革命’，令人已无回翔余地。”^③

北伐进程中，随着国共斗争和国民党内部分化的加剧，“反革命”也成为对立各方互相攻讦的武器。当宁汉分裂时，即有舆论指出：“今武汉与沪宁二派，同是国民党，向来同一主张，谁主谁客，举世莫辨，乃武汉以沪宁派为反革命，而大张挞伐，沪宁又以武汉派为反革命，而极口诋讟。”^④当时人还注意到：“大凡要陷害他人，只须任封一个‘反动’和‘反革命’的罪号，便足置对方于死地而有余。”^⑤“四一二”政变前夕，

① 《罪等》（社评），1927年6月2日《大公报》。

② 英竞：《甚么是反革命》、《还有些反革命啊（一）》、《还有些反革命啊（二）》，汉口，1927年1月24日、2月9-10日《民国日报》。

③ 《罪等》（社评），1927年6月2日《大公报》。

④ 《反革命》（社评），1927年5月5日《大公报》。

⑤ 大不睦：《党军治下之江西》，《醒狮》第118号，1927年1月7日。

蒋介石声称“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谁要反对我革命的，谁就是反革命！”^① 蒋显然充分意识到，谁垄断了“革命”话语的诠释权，谁就可以封任何人为“反革命”，就可以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1927年下半年国共分裂后，南京国民政府取得正统地位。这时国民党试图建构一元的论述体系，只有在国民党领导下，遵从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才是真革命，否则便是反革命。在这一过程中，“革命”话语日趋于专断，同时又隐含着相当的任意性。^②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毫无客观准则的情势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治罪条例》出笼，第一次将“反革命”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法律。法律条文贵在严谨，将一个极度泛化和不确定性的政治概念“绳之以法”，本身即隐含着浓烈的吊诡意味。

三 结 语

自清末至1920年代，随着革命在中国的潮涨潮落，革命话语亦一直处于流变与演化之中。1920年代国、共、青三党都主张革命而反对改良，认为革命是一了百了地解决国家和民族问题的根本手段。这种对革命的积极认证和遐想式期待，使革命日趋神圣化、正义化和真理化。革命被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翻身、新生等意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另一方面，国、共、青三党分别以各自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为依归来诠释其“革命”行径，使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化与正义化的同时，又意含着浓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成分。三党惟己独革、惟己最革的内在逻辑理路和策略考量，将“革命”与“反革命”建构成为一种圣与魔、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两极对峙，并借助武力和符号暴力，以不择手段的方式来削弱对方，乃至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最终激变为殊死斗争和军事较量。在这一过程中，截然两分的“革命”与“反革命”，却因变动不居和毫无客观准则可言，而令那些置身时局之外的人感到“难以辨识”和并不那么泾渭分明。

① 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演讲词》，1927年2月19日，清党运动急进会编《清党运动》，编者印行，1927，第4页。

② 关于近代中国革命话语的专断性和任意性，黄金麟在《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台北，《新史学》第11卷第1期，2000年）一文做过很好的个案揭示。

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革命确实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调，是主导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符码。今天，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我们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溶铸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离我们太近，我们常常因置身其中（主要指观念层面）而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性。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本文之作，仅是粗疏的尝试。

（发表在《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原文约34000字）